

毛泽东

语言艺术

鉴赏大辞典

李巨川

主编

中原农民出版社



李巨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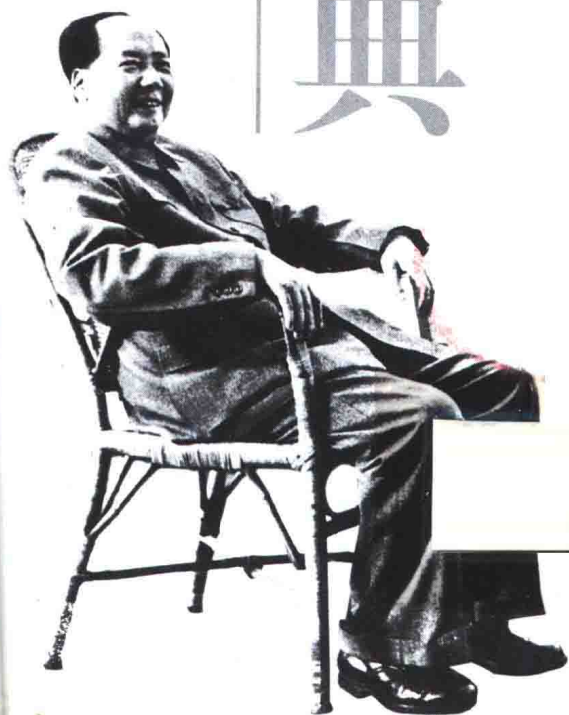
语言艺术

鉴赏大辞典

李巨川

主编

中原农民出版社



主编及撰稿人员

主 编	李巨川		
撰稿人	蔡镜浩	徐民华	范培松
	张舒屏	秦兆基	芮和师
	朱景松	翁几凯	李明敏
	房余龙	李巨川	侯 敏

毛泽东语言艺术鉴赏大辞典

李巨川 主编

责任编辑 马保民

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农业路73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9.625印张 741千字

1997年12月第1版 199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1—5 000册

ISBN 7-80641-006-6/H·001 定价 50.00元

编写凡例

一、条目选择范围：

- 1.《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 2.其他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论著；
- 3.《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 4.《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 1983 年版)；
- 5.《毛泽东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 6.《毛泽东早期文稿》。

二、本书内容：

- 1.前言：关于毛泽东语言艺术成就的综合评价；
- 2.主体：对有艺术特色的毛泽东著述中的语段的赏析；
- 3.附录：毛泽东关于语言及语言艺术的论述；
- 4.索引。

三、编排顺序：

- 1.前言；
- 2.主体；
 - (1)以选定的毛泽东著述中的语段为条目；
 - (2)每个条目配一段相关赏析文字组成辞条；
 - (3)若干条目出处相同的辞条组成部分；
 - (4)本书主体由五个部分组成，其编排顺序是：

条目出自《毛泽东选集》和其他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论著的辞条

——条目出自《毛泽东书信选集》的辞条——条目出自《毛泽东新

闻工作文选》的辞条——条目出自《毛泽东诗词选》的辞条——条目出自《毛泽东早期文稿》的辞条。

(5)同一部分的辞条,以条目原文之时间和页码先后为序编排。

3. 附录:以选定的各段有关论述为辞条单位,并以各段论述发表之时间和页码先后为序编排。

四、辞条中赏析文字的撰写要求:

1. 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以及各重大历史问题的评价,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理论依据;

2. 准确、全面地理解条目原文的背景和思想含义;

3. 深刻、正确地评价条目原文的语言艺术特点;

4. 角度集中,观点鲜明;

5. 重点突出,结构灵活;

6. 文字生动简洁,不超过 1100 字。

序

徐 迟

应编者的请求，给这本大辞典写一篇序，甚感光荣。

前几年曾经很偶然地在深圳讲过一次话，说我国近代有三位语言大师。第一位是曹雪芹，第二位是鲁迅，第三位是毛泽东。这个序次是按年代排列的，似乎没有别人这样讲过。

这个思想第一次提出来是在我自己的《红楼梦艺术论》中。我曾说过：“《红楼梦》的出现，就是我国的一次近代的语言革命。它简直是惊蛰的春雷。它为现代中国语言破了土，并奠了基，建筑了一座精美绝伦的大观园，作为典型环境和人物的榜样示范。”接着我还说：“《红楼梦》的语言，经鲁迅才得到进一步的加工与发展，然后又经毛泽东同志才达到了最完善的境界。我们现在所用的语言就是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还在进展中。”

我认为这几句话说得也没有错。好像也没有别人这样说过。对《红楼梦》的语言，我也只仅在我那本书的《形式与语言》这一章里专门议论过，是很不够份量的。对鲁迅的语言，我也曾研究过，但给一个论争卡住了之后，没有写成书。这里不能多说什么了。别人是否研究过、议论过鲁迅的语言，我不太知道。专著似未见到，但顺便谈到的，自然是不会少的。应当有专著，研究鲁迅的语言艺术，多多益善。我以为鲁迅这方面的功绩，除了将中国现代的语言提高到了严谨的理论高度之外，还作出过许多努力，要将东、西方的外国语言形式和风格、词汇等，溶化、融合到中国现代语言中去的努力，但

个别地方他没有达到完善无缺的成功。有许许多多有心人也参加了这个工作。而这一点,最后是由毛泽东同志完成的,而且是达到了最高境界的,因为他的语言确实做到了他自己提出来的“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要求,就是在他的古体诗词创作中亦不例外。

毛泽东的语言艺术应当有人研究,并写出不光是谈诗词(这样的书已有了),而且是专门集中地谈语言艺术(也包括谈诗的语言在内)的专著来,似乎还没有,也许这是因为谈毛泽东著作的人,主要谈他的文章内容,似未见有人专谈他的语言艺术、语言形式或文字形式的。而他自己倒是写有专著的,如《反对党八股》等等,是谈到了语言问题的。可惜的是党八股非常顽固,是个不倒翁。由此可见,毛泽东的语言艺术还必需研究,更加深入探讨,才能好好地“反对”掉这个“党八股”的顽固大敌。

可见,不谈他的语言形式如何能谈他的思想内容?不谈他的语言生动怎么能展现他的内容光辉呢?我们的评论家,一般地说是较少注意到生动活泼的形式的。有些人的唯物论有点偏,他们就是缺少一点辩证法。谈物质多,谈精神少;谈斗争多,谈统一少。毛泽东光华四射的思想正是用他的生花妙笔和精彩语言表达出来,吐露出来的。他是用他自己独特的语言形式来发挥他的深刻的思想内容的。

“东风压倒西风”是林黛玉的语言,仅涉及闺房中的尖锐斗争,只有在毛泽东一引用之时,问题就扩展到了普天下的大趋势去了。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也是毛泽东说出来的。这是他的语言艺术一例。当他说到文化生力军的“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勇猛,简直是所向无敌的”,这也就描绘出来了鲁迅的阵营之语言艺术的力量之强大。它尤其鲜明地显示出来了毛泽东自己的语言艺术力量的强大有力。三位语言艺术大师各具有特点,而其中最具强大的力量的不能不是毛泽东同志的语言艺术了。

因此,编纂一部《毛泽东语言艺术鉴赏大辞典》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编成这么一部书是很不容易的。书已经摆在读者的面前了,关于词条等等,就不必多说了。

有着一座语言艺术最富蕴的矿藏,这里的这部分是已被开发出来的。大部分还未被开发出来,就要继续进行开发。对于这些已开发和未开发的矿藏的研究和分析,考证和注释等,应当一步一步地做下去,不可畏缩不前,不可因噎废食。大胆谨慎,严肃认真地去做,是必定会做出成绩来的。这个工作我们并未做得很多,而是做得太少了。世界的变化很快很大,我们要加紧赶上前去。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什么宁缺毋滥,“滥”当然不对,“缺”就更不对了。君不见已有多少美好的、珍贵的东西,正在被遗忘,似在失传了吗?

毛泽东的语言艺术

李巨川

“只要为人民留点文就行了!”

毛泽东亲手缔造了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戎马数十年，征战百千强，但是他本人从不挂军衔，从不佩勋章。他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带枪出现在公众场合，只有“朱毛会师”那一次。

毛泽东亲手缔造了一个伟大的人民共和国，为了国家的繁荣昌盛，他呕心沥血，亲自主持制订过四个宏大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五年计划，可是他不同意人们把他的头像印到钞票上去。

“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张昆递 1917 年 9 月 23 日日记，转引自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04 页）毛泽东 24 岁那年，在岳麓山下周家台子的“洴菰寄庐”，与二三挚友秉烛夜谈，慨然言志。这是他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的人生理想。

“我这个人啊，只要为人民留点文就行了！”（张仙朋《为了人民……》，《当代》1979 年第 2 期）垂暮之年，言及个人最终愿望，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这样说。此时的毛泽东早已“曾经沧海”。他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种领域里的人生搏战中，都获得过极其辉煌的“高峰体验”。这样的“高峰体验”，一般人只要能在其中某一领域中的某一小小的方面尝到过一次，就足以无愧人生了，而毛泽东到老仍是书生本色，在他的心目之中，一切皆不足道，念念不忘的

唯有著书留文的初衷。

我们从中看到的是一种个人的人生价值取向。在服从祖国、人民和党的意志的大前提下，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保持个人的人生价值取向的充分自由，毛泽东当然也是这样。

值得深思的是：毛泽东的人生价值取向执着稳定，始终如一。这种稳定性，植根在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处。中国人视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与吴质书》），已有两千年的悠长历史。文章之事，早已是中国政治的一个重大内容。历代大政治家，莫不高度重视文章。作为一个中国式的马列主义的革命家，毛泽东把著书留文作为自己最主要的人生事业，把它当作自己最主要的本职工作，是必然的事。

毛泽东一生著述数量丰富，体式多样，旨深论宏，体大思精，均不必细论。值得注意的是：他是有史以来读者最多的文章作家。

毛泽东著作中的思想观点和思想方法，已经深深地渗入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作为一种客观效应，毛泽东的文章风格、文章理论，甚至语言习惯，都将对中国的历史文化造成深远广大的影响。没有哪一部公正的中国文章史可以忽略毛泽东这样一位文章家的历史存在。

中国气派的马列主义大手笔

毛泽东的文章，因其负载着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马列主义，而相对数千年的中国文章传统，具有全新的意义；又因其出自一位具有深厚传统文化素养的、以“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为最高审美追求的作者之手，而具有鲜明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1. 冰山的品格 由于在了解和研究“中国这个地盘”方面狠下过苦功，由于对反映中国社会现实的客观事实总是怀有浓厚的兴趣和深情的迷恋，所以，毛泽东写文章很少引经据典，却非常注重

运用事实论据来证明论点。

在各种事实论据中,他又很少使用枯燥无味的数据,也难得采用过分具体的事例。他擅长并且常用的是那种在大量具体事实的基础上,经过一定概括的事实论据。这类论据,是支撑整座毛泽东思想理论大厦的主要支柱。这一特点,使毛泽东的文章具备了一种冰山的品格,它的基础雄厚坚实,而露出海面的仅是一小部分,简洁扼要而又无可动摇。

2. 长于思辨,重于直觉 毛泽东完好地保持着本民族长于思辨,重于直觉的思维特征,并在它们与马列主义的辩证思维之间找到了相通相容之点。因此他文思敏捷,无所拘束,总能一进门就抓住问题的实质,总能把复杂的事物分析得里外通透,把深刻的道理解释得简单明了。

他看问题和写文章,都力求用辩证的方法。一种是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时间和一定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他自己把这种方法称作“古今中外法”。另一种是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像所有杰出的思想家一样,毛泽东兼备分析和综合两种才能,而且在运用中还有自己的中国特色。在哲学建树上,是毛泽东创造性地把“全面性原则”列入了辩证法的基本特征之中;在文章写作上,他经常大量调动各种相对的辩证范畴,以达到对事物的全部联系和多样性规定的把握,得出对事物整体的认识。注重事物的整体,是中国传统思维的特点和长处,毛泽东吸收其精华,因此写文章总能高屋建瓴,挥洒自如。

3. “形象思维第一流” 在政论、演说和报刊时评中,毛泽东是运用形象手段的高手。他常常借助古典名著中的形象,或概括描绘生产中的形象,或运用富有形象性的语言来说明事理,嘻笑怒骂,生动活泼。因此,郭沫若说他“形象思维第一流,文章经纬著春秋”(《毛泽东诗词学习参考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1

页)。英国女作家韩素音也发现:“他的政治著作就是艺术创作”(韩素音《早晨的洪流》,转引自苏扬编《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365页)。毛泽东在文章中描绘形象一律采用简笔白描,生动传神,且富幽默感,这正是本民族的多数人喜闻乐见的。毛泽东写作用的基本语言,是人民群众的口语。中华民族的群众口语充满形象性,因此,群众口语中的形象是毛泽东文章中的形象的主体。

4. 保留“认识的中介” 在毛泽东常用的议论性文体中,有一类是用于研讨问题和理论思辨的科学论文。这种文体,抽象程度相对较高,对具体直观的东西提炼比较彻底,留给形象思维活动的空间极为有限。形象,这种具体直观的东西,在黑格尔看来都属于“认识的中介”,在产生理论的理性活动中,他主张将“中介”一律粉碎,一概扬弃。在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现代科学思维中,理论是灰色的,它们的表现形式也只能是灰色的。毛泽东明显不同,即使在推理严密、高度抽象的科学论文里,他总是津津有味地保留一些形象的成分。理论是灰色的,但在毛泽东笔下,它的表现形式可以、甚至应该是多采多姿的。毛泽东的科学论文的写法,追求的是中国传统的长处与现代科学的长处的结合。当今,西方科学论文的写法也出现了某种努力增强形象性的“散文化趋势”。有人甚至说:在物理学中你也不能不叙述故事。这说明,毛泽东的科学论文的写法,具有历史的超前性。

5. 雄健浩荡的气势 气势雄健,是毛泽东文章的一个总体特征。

“文气”取决于“人气”,毛泽东的精神气质中最重要和最有魅力的特征是:乐于对抗,勇于挑战,并且,压迫愈甚,对抗愈烈;对抗愈烈,精神愈振。这样的“人气”,清晰可鉴地体现在他的文章里:越是面临重压,毛泽东的行文气势就越是强劲有力;凡是有具体对立面的文章,他都写得气势磅礴,锐不可挡。

中国古代文化关于文章气势的研究,还注意到“情与气偕”(刘勰《文心雕龙·风骨》)的规律,深厚强烈的情感,是浩大劲健的文气原初的驱动力。毛泽东是个感情丰富而深沉的人,他的文章因情深意长而慷慨多气。

文章气势,又与文章的结构、语言等表现方式有紧密关系。这方面,由中唐韩愈开端的古文派有世代相传、绵延千年的精湛研究。毛泽东写作注重“蓄势”,讲究“颠倒簸弄”(毛泽东《讲堂录》,《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81页),常在文章的篇章、段落、层次的起点处摆出对立的观点,提出疑问,有意设置障碍,使行文犹如奔涌东去的黄河,九曲连环,气势磅礴。他还经常采用欲扬故抑、欲抑故扬的手法助长文章波澜。尤其是他的一些长篇大论的文章,大开大合,东折西转,表现出他非凡的文字组织调度的能力。他经常不顾写家大忌,不拘现成章法,采用上下左右腾跃突进的写法,造成文章浑灏流转的博大气势。他经略长篇文章的风格,总使人联想起他经略战争的风格。毛泽东还注重语句的“声之高下”和“句之短长”(韩愈《答李诩书》)的安排,造成语言的铿锵节奏,于细微处增添文章气势,使文章不仅有强大冲击力和震撼力,而且易上口,耐诵读。

6. 通俗幽默的语言 毛泽东是位个性鲜明的语言大师。

首先,他的所有文章都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作的。他的文章的诉诸对象主要是革命队伍中的干部,也有兼以干部和群众为对象的,大多是不识字和识字不多的工人和农民。毛泽东写作,要把复杂的马列主义科学体系与复杂的中国实际相结合,可说是项极其复杂的工作。这样,他就遇到了一个一般文章作家难以解决的矛盾:复杂的内容和通俗的形式的矛盾。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是解决矛盾的唯一办法。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这方面的艰难尝试,始于近代白话运动。近代白话运动是中国近代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力主以主动积极的态度从人民群众语言中

088165

汲取养料,并有大量语言实践的,是中国现代两位最优秀的语言大师,即毛泽东和鲁迅。相比之下,毛泽东的语言更接近普通话,并且,正式出版的毛泽东著作,经过有关专家的编辑校订,特别注意语言的规范。人民群众的语言在毛泽东文章里的表现,都是概括而不抽象,扼要而不艰深的。毛泽东还常常自然完美地自铸新词,创造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易懂易记的崭新语汇,它们总是生动的新鲜的,符合语言习惯的,还都有用字平易、读音响亮的特征。这些新词由于通俗而富有生命力,将长期活跃在现代汉语中。

毛泽东语言个性的另一个特征,是旷达自信的幽默。这一特点,使毛泽东的语言风格具有一种极高的品味,它表明毛泽东对自己从事的革命、对自己阐述的理论,具有充分的自信,表明他坚信自己在力量上、智慧上和道义上占有绝对优势。中华民族是个高度睿智的民族,又是一个高度自信的民族。这个民族在鬼魅横行的黑暗里,需要辛辣带刺的幽默;在温饱不愁的太平光景,也乐于接受恬适机智的幽默。但从整体看,中华民族是个奋斗进取的民族,毛泽东那种旷达自信的幽默,与民族特性恰有一种天然的投契。

鲜明独特的个人风格、卓而不凡的艺术品味,是被称为“大手笔”的文章作家的标志。毛泽东正是我们时代、我们民族的大手笔。

既是大作家,又是文论家

毛泽东有系统的马列主义文章理论。对于文章与客观事物的关系、文章的价值标准、价值实现等重大理论问题,对于文章的聚材、炼意、章法、技法、行文、修改及语言文字要求,他都有精深的论述。

1. “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 这是毛泽东对于文章本质的见解,也是他的文章理论的核心。人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自会形成种种具有积累价值和交流价值的思想和认识,文章

就是用来完善、固定、存储和交流这些思想认识成果的工具。作为这样一种工具,文章就必须正确地反映人在实践中所认识的客观世界,为人的进一步的实践活动提供有价值的思想内容,于是就有了“言必载物”和“言之无物”的分野。文章反映了客观世界,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内容,就是言之有物;反之,文章反映不了客观事物,给不出思想内容,就是言之无物。毛泽东在与党内文章形式主义的斗争中,把“言之无物”列为党八股的头条罪状,强调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力主“禁绝一切空话”,坚持了正确的文章观,使文章形式主义在理论上遭到了彻底的清算。

2. “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 与文章本质问题紧密相关,毛泽东还提出了他的马列主义的文章价值标准。文章价值的前提,在于对社会有用与否。毛泽东的“箭的论”,来自对中国传统文章理论中合理成分的继承。中国传统的文章价值观,突出文章“经世致用”的政治教化功能,排斥视文章为“进取之阶、宫室之奉、妻孥之养、哺啜之具”(毛滂《上苏内翰书》)之类的庸俗观念,鄙视拿文章去作玄空清谈和无聊游戏的做法,也不屑用文章去歌功颂德,润色鸿业,所以具有进步意义。毛泽东在强调文章必须“有用”之外,还明确要求文章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这是传统的经世致用的文章价值观所不可能具备的内涵。

这里需要略加说明的是:毛泽东的文章价值标准是一般文章的价值标准,主要是针对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广泛使用的非文学文章的。文学文章是一种特殊的文章,决定它们的价值的除了一般文章的规律之外,还有文学艺术的特殊规律。看到了这个特殊性,我们便能更加准确地把握毛泽东的“箭的论”。

3. “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 反复强调要树立明确的读者意识,是毛泽东文章理论的一个突出的特色。读者是文章这种精神产品的接受者。文章只有通过读者,才能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没有读者的文章就是没有消费者的商品,自身的品质再好还是没有

用。古往今来杰出的文章家，都具有高度自觉的读者意识。近现代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是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争取自身解放的伟大运动，它的深刻性和广泛性，是历史上任何别的政治运动无可比拟的，因此从事无产阶级革命的文章作者，应具备最为自觉的读者意识。毛泽东的一篇《反对党八股》，所讲到的每一个问题都直接、间接地关乎读者意识：“文章太长了，有谁来看呢？”“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做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这样动情地为读者大声疾呼，毛泽东是文章史上第一人。

中国历史上不乏著述等身、风采独具的文章作家，也不乏有建树有影响的文论家，然而，只有为数极少的既有丰富的写作实践、独特的文章风格，又有自成系统的文章理论建树的人，才堪称大文章家。毛泽东正是这样的大文章家，而且是马列主义的大文章家。

彻底改造社会文风

重视社会文风，是中国文化特有的传统。中国人早就注意到“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刘勰《文心雕龙·时序》）。历史上的政治力量，尤其是新兴的政治力量，干预社会文风的事例屡见不鲜。杀伐决断的曹操如此，宽容仁慈的隋文帝也如此，连识字无多的朱元璋也未敢懈怠。他们一般都凭借权力，直接干预文风，生杀予夺，雷厉风行，真也能生效一时，客观上促进健康文风的发展，但都不能持久。

毛泽东既是大政治家，又是大文章家。他以双重身份干预社会文风，作用之大，影响之远，显然是历史上任何一位大政治家或者任何一位大文章家都无可比拟的。近代中国是剧烈变革的中国，数千年的封建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冲击，社会文风经历着有史以来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除了鲁迅，没有人能像毛泽东那样

高瞻远瞩,关注文风发展潮流。毛和鲁,心犀相通,各有千秋。相对而言,鲁深沉,毛博大;鲁是文坛巨人,着眼于文学文章这类特殊文章的社会世风,毛是政治领袖,他关心的主要是以政治文章为主的一般文章的社会风气,涉及更广;鲁为环境所迫,说话曲折隐晦,毛有抗日民主根据地,尽可大声疾呼;鲁孤军奋战,而毛则领导着一个马列主义的大党。所以,唯有毛泽东担当得起彻底改造中国社会文风的重任。

毛泽东依靠中国共产党这个领导核心,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充分说理,使腐朽文风人人喊打,使优良文风深入人心。而后,又随革命形势的发展,将文风改造由党内推向整个社会。这种做法,与封建政治家干预文风的发号施令、杀伐决断,与封建文士凭借少数个人的声望,在文人小圈子里“回狂澜于既倒”,都是根本不同的。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继承并融汇了历史上优良文风的精华,提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的文风标准。这标准,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的提法是:“……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反对党八股》中的提法是:“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风”。马列主义的文风标准的提出,在中国文章发展史上是石破天惊第一次。

毛泽东在他正处于生命的峰巅的时候,曾满怀激情地阐述过要建立一个“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706页)的伟大构想。他一生的文章实践、文章理论和改造社会文风的实绩,其实都是实践这一伟大构想的典范。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大政治家有过像毛泽东这样辉宏的胆略和深远的目光,也从来没有哪个大文章家有过像毛泽东那样辉煌的文章业绩和彻底的理论建树。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毛泽东是位千古罕见的大文章家。